

清代贵州地方志所记录民族 语言资料概说*

乔立智

提 要: 现存清代贵州地方志约 80 种, 记录着丰富的民族语言资料。在深入调查与系统挖掘的基础上, 对清代贵州地方志中民族语言资料的分布、类型及研究价值等进行简要论述。其分布总体不甚均衡; 其类型主要有名词、动词与形容词、数量词与颜色词、短语和句子、特殊地名五大类; 其研究价值直接体现在增进语言与文化关系之研究、便于综合考察民族语言词汇的理据和内涵、有利于直观分析民族语言中特殊的构词方式、有利于民族语言史之研究诸方面。

关键词: 清代贵州 地方志 民族语言

据整理统计, 现存清代贵州地方志约 80 种, 其中记录着丰富的民族语言资料。这笔宝贵财富, 已引起学界的重视, 且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不过, 总体而言, 学界对清代贵州地方志所记录的民族语言资料之研究, 或只举例说明, 或只简单介绍, 或仅论及短时期、小地域地方志, 却鲜有从历时与广泛角度进行考察和探索, 至于系统的整理研究, 则更为少见。文章在全面调查与深入挖掘的基础上, 对清代贵州地方志所记录民族语言资料的分布概况、类型特征、研究价值三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以期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参考。

一 清代贵州方志所记录民族语言资料的分布情况

现存约 80 种清代贵州地方志, 记录有民族语言资料者为数不少, 但各志所录, 论其形式, 或集中于一两个专栏, 或分散在多个版块; 论其内容, 则或多姿多彩, 或零零碎碎, 总体情况复杂, 研究者要在这些体系庞大的方志中逐一翻检所需资料, 必将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且难免挂一漏万。有鉴于此, 在对清代贵州地方志进行全面深入考察的基础上, 将其中所记录的民族语言资料分布情况列表如下。^①

据该表可知, 清代贵州方志所记录的民族语言资料, 主要分布在“方言”“风俗”“风土”“族属”(或“族类”)“种姓”“村寨”等版块, 此外, “疆域”“物产”“赋役”“艺文”“杂记”“考辨实绩”等栏目亦时有记录, 但不如上述版块集中丰富, 搜集整理时, 需更加细致方能发现。

* 本文为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明清、民国滇黔地方志所记录的民族语言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18XY031) 及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以来西南官话区地方志方言俗语集成”(项目编号: 17ZDA313) 研究成果。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① 按: 目前我们的考察, 主要以“‘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编”为对象, 此编共收录清代贵州方志 71 种, 其中记录有民族语言资料的方志共 27 种; 表格所列, 为或多或少地确实载有民族语言资料的方志, 其余未记录民族语言资料的方志, 均略而不列。

清代贵州地方志所记录的民族语言资料分布情况表

方志名	修纂人	版本	所在卷数及页码
康熙《黔书》	田雯撰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民国黔南丛书重排铅印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影印	卷上《方言》, 第484页
康熙《天柱县志》	王复宗纂修	巴蜀书社, 2006年, 1968年台北成文出版社据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影印	上卷《坊乡》, 第75—77页
乾隆《贵州通志(一)》	鄂尔泰等修, 靖道谟、杜淦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乾隆六年(1741)刻、嘉庆修补本影印	卷7《地理·苗蛮》, 第117页
乾隆《普安州志》	王粤麟修, 曹维祺、曹达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1964年贵州省图书馆复制油印本(乾隆二十三年刻本)影印	卷23《苗属》, 第181页; 卷25《方言》, 第186—200页
乾隆《独山州志》	刘岱修, 艾茂、谢庭薰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1965年贵州省图书馆据北京图书馆藏乾隆二十三年刻本复制油印本影印	卷3《地理志·村落》, 第86—88页; 卷3《地理志·方言》, 第92—94页
乾隆《南笼府志》	李其昌纂修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1965年贵州省图书馆据湖北省图书馆藏乾隆二十九年稿本复制油印本影印	卷2《地理·苗类》, 第539页
乾隆《毕节县志》	董朱英修, 路元升等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1965年贵州省图书馆据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二十三年刻本传钞本之复制油印本影印	卷4《赋役·土夷》, 第258页
嘉庆《黔记》	李宗昉撰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民国黔南丛书重排铅印道光十四年(1834)刻本影印	卷1, 第553、559页; 卷3, 第572、574页; 卷4, 第586页
嘉庆《黔西州志》	刘永安修, 徐文璧等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嘉庆九年刻本影印	卷2《村寨》, 第133—134页

(续表)

方志名	修纂人	版本	所在卷数及页码
嘉庆《续黔书》	张澍撰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民国黔南丛书重排铅印光绪十五年(1899)贵阳熊氏族刻本影印	卷5《俗字》, 第588页; 卷5《化虎》, 第589页
同治《苗疆见闻录》	徐家幹撰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民国贵阳文通书局原刻校印本影印	卷20, 第603页
同治《毕节县志》	王正玺等修, 周范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1956年贵州省图书馆据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同治十三年(1874)稿本影印	卷8《风俗·夷俗附》, 第422页
道光《贵阳府志(三)》	周作楫修, 萧瑄等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同治十年朱德璉授堂刻本影印	卷88《苗蛮传》, 第34、35页; (余编)卷19《杂识上》, 第275页
道光《广顺州志》	金台修, 但明伦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道光二十七年广阳书院刻本影印	卷1《舆地志·疆域》, 第387—389页; 卷10《风俗志附方音》, 第455—457页; 卷12《杂记》, 第502页
道光《永宁州志》	黄培杰纂修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道光十六年初刻、光绪二十年沈毓兰重刻本影印	卷3《地理·村寨》, 第490—493页; 卷10《风土·方言》, 第561—562页
道光《安平县志》	刘祖宪修, 何思贵等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1964年贵州省图书馆据上海图书馆藏道光七年刻本复制油印本影印	卷5《苗俗·苗语侬语》, 第117—121页
道光《松桃厅志》	徐铤修, 萧瑄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道光十六年松高书院刻本影印	卷3《疆域·民村》, 第483—496页

(续表)

方志名	修纂人	版本	所在卷数及页码
咸丰《兴义府志(一)》	张镛修, 邹汉勋、朱逢甲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民国三年(1914)贵阳文通书局据咸丰四年(1854)刻本铅排本影印	卷9《屯寨》, 第145—156页; 卷41《苗类》, 第385—386页; 卷42《风土志·苗语》, 第392—406页
咸丰《安顺府志(一)》	常恩修, 邹汉勋、吴寅邦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咸丰元年刻本影印	卷5《疆里·村寨》, 第72—75页; 卷6《疆里·村寨》, 第86—89页; 卷7《疆里·村寨》, 第107—108页; 卷15《风俗·夷语》, 第200—204页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	曹昌祺修, 覃梦裕、李燕颐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光绪十五年刻本影印	卷4《地理·苗蛮》, 第350、351—353页
光绪《水城厅采访册》	陈昌言纂修	巴蜀书社, 2006年, 依照1966年贵州省图书馆据上海图书馆钞本复制油印本(本光绪钞本)影印	卷4《食货附族姓方言》, 第284—289页; 卷4《食货·土俗·苗俗》, 第290页; 卷4《食货·土俗·罗罗俗》, 第291页; 卷4《食货·土俗·蔡家俗》, 第292页
光绪《黎平县志(一)》	俞渭修, 陈瑜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光绪十八年黎平府志局刻本影印	卷2(下)《苗蛮·苗语》, 第184—187页
光绪《古州厅志》	余泽春修, 余嵩庆等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光绪十四年刻本影印	卷1《苗语》, 第302—305页
光绪《续修天柱县志》	林佩纶等修, 杨树琪等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光绪二十九年刻本影印	卷2《地理志·乡里》, 第169—172页
光绪《荔波县志》	苏忠廷修, 李肇同、董成烈纂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1965年贵州省图书馆据光绪元年稿本复印本影印	卷2《地理志·村寨》, 第335—339页

(续表)

方志名	修纂人	版本	所在卷数及页码
光绪《安南 县乡土志》	易辅上编辑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1964年贵州省图书馆据北京图书馆藏宣统元年(1909)钞本复制油印本影印	六《人类》, 第605页
宣统《贵州 地理志》	佚名撰	巴蜀书社, 2006年, 据1966年贵州省图书馆复制宣统二年油印本(八卷)影印	卷3《种族》, 第514页

二 清代贵州方志所记录民族语言资料的类型

清代贵州方志所记录的民族语言资料, 主要有名词、动词与形容词、数量词与颜色词、特殊地名四类, 每一词类下面包含着不同的内容; 此外, 清代贵州方志所记录的民族语言资料中, 也有少量的短语或句子, 此类资料, 数量虽少, 但内涵丰富, 其研究价值亦不菲。以下分别论述。

(一) 名词。这一类资料数量最多, 其余各类, 其绝对数虽也不少, 却难于与之相较。这些名词, 总体可分为称谓、天象地理、时间方位、动植物、生产生活、人体、民俗文化七小类。

1. 称谓词。例如, 同治《苗疆见闻录》卷21: “人皆缺舌, 不通汉语, 其称官谓‘蒙’……其他: 父曰阿罢, 亦曰阿扒, 母曰阿蒙, 亦曰阿米, 吃饭曰固麦, 亦曰鲁羹, 饮酒曰呵交, 亦曰好究, 皆属蛮音, 多不可识。家不配神, 只取所宰牛角悬诸厅壁, 其有‘天地君亲师’神位者, 则皆汉民变苗之属。”^①

本则中, “父曰阿罢, 亦曰阿扒”, 其音义皆与汉语“阿爸”极似; “母曰阿蒙, 亦曰阿米”亦与汉语“阿妈”“阿母”类似, 但不能断定它们都借自汉语, 因为“爸”“妈”或“阿爸”“阿妈”之音, 不少语言中都有, 可能是一种对于父母的不谋而合的共同称谓。至于“饮酒曰呵交, 亦曰好究”, 其音义无疑借自汉语“喝酒”; “吃饭曰固麦, 亦曰鲁羹”则应为该民族语言的原始成分。又“其有‘天地君亲师’神位者, 皆汉民变苗之属”一语, 值得玩味。民族语中汉文化成分, 不一定总是由于汉民族的强势影响而输入, 有时乃是因为周边少数民族人口众多, 文化气场强大, 从而使得汉民族主动融入其中, 甚至改变自己汉人的身份, 积极地从语言、习俗、服饰、饮食诸方面向周边强势少数民族靠拢, 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下的民族语言, 其间的汉语及汉文化成分, 可能只是一种根深蒂固或潜意识的保留。有鉴于此, 研究某一民族的语言, 不能不从该民族的源流上加以适当地考虑, 并从原始与后生、主动与被动、强势与弱势等多角度进行双向考察。

2. 天象地理名称。清代贵州方志中, 凡集中专门记录民族语言资料之处, 一般都少不了天象地理名称的身影——《尔雅》有“释天”“释地”“释丘”“释山”诸篇, 《广雅》如之, 可见此类记录并非凭空独创, 而是传承有自。这些词语, 多为常用词, 与汉语中所谓“基本词”

^① 徐家幹撰: 同治《苗疆见闻录》, “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 巴蜀书社, 2006年, 第19册, 第603页。

类同。例如道光《广顺州志》卷1《风俗志·附方音》：“苗音鸩舌，非翻译不解。其称呼天曰各达，称地曰罗，称日曰奈，称月曰喇，称云曰睹，呼天晴曰鲁内，呼天阴曰乍内，呼天晚曰茫内，呼夜行曰晦际，呼风曰箕，呼雨曰依，呼雪曰拍，呼山曰补，呼上山曰溜补，呼路曰能勾，呼塘曰各印；呼田曰蜡屋，亦曰补；呼耕田曰烁喇，呼耕地曰烁落。”^①

3. 时间方位名称。清代贵州方志所记录的时间名称，内容及范围包括年岁、月份、时辰等。其记录或以传统天干地支，或以后来所通用的名称，方式不一，这与修纂方志者所处时代、用语习惯、价值观念等都有一定的关系。例如光绪《水城厅采访册》卷4《方言·罗罗言》：“甲曰这，乙曰齐，丙曰被，丁曰升，戊曰肯，己曰坵，庚曰卢，辛曰赫，壬曰得，癸曰都，子曰哈，丑曰尼；寅曰路，又曰赋；卯曰他暑，辰曰鲁，巳曰奢，午曰目，未曰和，申曰诺，酉曰挖，戌曰期，亥曰凹。”^②

此例时间名称，均以传统天干地支记录，由于古今记时名称和内涵的变化，整理研究时，需要进行一定的转换。也有用后来所通用的时间名称记录的，如光绪《古州厅志》卷1《苗语·年月》、咸丰《兴义府志（一）》卷24《风土志·方言·仲苗语·年月》等条目，其中用以对译的汉语时间，全为后来通用之语，这与修纂者所处时代环境亦不无关联。

方位名称，则无非东南西北上下前后之类，所记简略，未如时间名称详尽。例如光绪《古州厅志》卷1《苗语·方位》：“东曰勾馘代，南曰勾馘莽，西曰纪中，北曰纪达，上曰溜，下曰落。”^③

4. 动植物名称。《尔雅》有“释草”“释木”“释畜”“释虫”“释鱼”“释兽”诸篇，《广雅》大体如之，可见其记录体例亦有所本。其间所记动物名称，多为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家畜类，野生动物类亦不少见。例如乾隆《独山州志》卷3《地理志·方言·仲家语》：“马曰麻，牛曰节，鸡曰盖，犬曰骂，豕曰暮，鹅曰罕，鸭曰并，蛇曰额，虎曰共，豹曰标，虾曰乌，鸟曰若，草曰哈，木曰歪。”^④植物名称，有农作物、果木等，但所记多为常见之类，且多不详尽，例如咸丰《兴义府志（一）》卷42《风土志·方言·仲苗语·谷蔬》：“麦曰豪索，包谷曰豪宋，红稗曰阿烘，小米曰阿翁，莽曰豪格，豆曰豪佃，绿豆曰萎比落，豇豆曰乌格豆，扁豆曰阿巴。”又“花木”：“花曰歪，兰曰罗乃，藤曰石高，竹曰肥雷，芭蕉曰勒追蕉盈，木曰姑肥，松曰肥既，桐曰肥高，漆树曰肥勒，棕树曰肥农温，柳曰肥鲁。”^⑤

5. 生产生活名称。包括饮食生活、服饰房屋、生产工具等，其中饮食器用名称居多。饮食生活名称，例如咸丰《兴义府志（一）》卷42《风土志·方言·仲苗语·饮食》：“酒曰醪，饮酒曰哽醪，饭曰豪，吃饭曰哽豪，早饭曰哽矮，午饭曰哽林，晚饭曰哽少，吃肉曰哽糯，吃烟曰哽烟，烟竿曰暮烟，烟包曰立合不论，吃茶曰哽者，茶杯曰松茶，油灯曰更当，盐曰盐，粥曰戎奥。”^⑥其中“哽醪”（饮酒）、“哽豪”（吃饭）、“哽糯”（吃肉）、“哽烟”（吃烟）、“哽者”（吃茶）均为动宾结构的复合词，如果严格按照词语类型进行划分，不应与“饮食类”名词归为一类，不过，方志所记录民族语言资料，常有只按大体而不作具体细致归类的情况，这是一种时代特征，整理研究时，不应过分苛责。

① 金台修，但明伦纂：道光《广顺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7册，第455页。

② 陈昌言纂修：光绪《水城厅采访册》，“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5册，第286页。

③ 余泽春修，余嵩庆等纂：光绪《古州厅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9册，第303页。

④ 刘岱修，艾茂、谢庭薰纂：乾隆《独山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4册，第92页。

⑤ 张铨修，邹汉勋、朱逢甲纂：咸丰《兴义府志（一）》，“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8册，2006年，第397页。

⑥ 张铨修，邹汉勋、朱逢甲纂：咸丰《兴义府志（一）》，“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8册，第394页。

器用名称,例如道光《永宁州志》卷10《风土·苗语仲语合译左苗语、右仲语·器用》:“斧曰独、玩,镰刀曰鲁无、零,锁曰素、冷龙,钥曰钥匙、即龙,戡曰顿、登,秤曰直、丢,笔曰笔、奔,墨曰墨、芒,书曰道、撒,读书曰何道、又果瘦,扇曰芙、必,锣曰那、向,鼓曰卓、光,钟曰仝、同,磬曰仝、同,叭呐曰罗博、打的,芦笙曰泡惟、汲速。”^①以上器用名称,多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笔曰笔、奔”“墨曰墨、芒”两条可知,该地苗语、仲语“笔”“墨”二词均借自汉语,从“钟曰仝、同”“磬曰同、仝”两条则可知,彼时该地苗语、仲语对于汉语中显然有别的“钟”“磬”不予区分,这可能与这两个民族物质文化生活中本无钟、磬有关。

6. 人体名称。清代贵州方志中,举凡相对集中地记录了民族语言资料之处,大都包含人体基本名称。例如咸丰《兴义府志(一)》卷42《风土志·方言·仲苗语·身体》:“头曰拱交,发曰编老,额曰拏岂,面曰岂拏,眉曰奔大,眼曰论大,耳曰雷,鼻曰包浪,口曰班,发曰孟,齿曰阿油,舌曰冷,项曰少华,肩曰高巴,背曰白浪,手曰冯,掌心曰降冯,大指曰蔑冯,小指曰娄冯,胸曰那个,乳曰莫,腰曰亨,腹曰蔑董,脐曰立波,足曰不顶,腿曰街棒,茎物曰完,膝曰卯,足肚曰街,胫曰打包,足心曰丢顶,足指曰老顶,臀曰不馱。”^②

本则记录,“手曰冯”“掌心曰降冯”“大指曰蔑冯”“小指曰娄冯”等条值得注意,即“降冯”“蔑冯”“娄冯”逐一直译为汉语,是为“心掌”“指大”“指小”,其结构为“中心语+修饰语(定语)”,与汉语的“定中结构”正好相反。

7. 民俗文化词。总体而言,清代贵州方志中民俗文化词的记录不算丰富,且多零散分布在“地理”“种族(族类)”等版块,其内容则以节日习俗、祭祀迷信名称为主。例如乾隆《毕节县志》卷4《赋役·土夷》:“病不延医,惟尚鬼而用巫祝,身死则棺殓而焚之野,招魂以葬,结松为棚,设灵幄于中,谓之‘翁车’,富者宰牛四五十头以祭,会葬亲戚数百人,披甲驰马,疑若攻战,谓之‘赶戛’。”^③“翁车”“赶戛”均民族语词,有必要从源头上加以探索并分析其内涵。

又如同治《毕节县志稿》卷8《风俗·夷俗》:“饮食用马匙,盛菜以木盃,名曰‘补肚’,酒喜啞酒。土目不与其下为婚,黑种不与白种为婚,而烝报旁通,覩不恋也。土日常虐使其下,以供争讼、婚葬之费,名曰‘扯手’,然性忠朴,虐至死,恒不敢悖。”^④“补肚”应是民族语词(音译),“扯手”则有待考察,有可能是彼时当地汉语方言口语中的一种说法。

此类词语的记录虽不多见,却值得注意,对于特定时期语言所承载的民俗文化信息之研究不无裨益。

(二) 动词、形容词

多为行为动作、状态描述之类,数量不多,但绝对数也不算少。行为动作类,例如道光《广顺州志》卷1《风俗志·附方音》:“呼葬曰两内,呼祭曰绰滚,呼请客曰请内哈,呼叩头曰不备……呼哭曰业,呼笑曰咒,呼立曰烁,呼坐曰重,呼卧曰卜梦。”^⑤

状态描述类,例如咸丰《兴义府志(一)》卷42《风土志·方言·侗苗语·饮食》:“香曰

① 黄培杰纂修:道光《永宁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0册,第561页。

② 张镛修,邹汉勋、朱逢甲纂:咸丰《兴义府志(一)》,“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8册,第393页。

③ 董朱英修,路元升等纂:乾隆《毕节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9册,第258页。

④ 王正玺等修,周范纂:同治《毕节县志稿》,“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9册,第422页。

⑤ 金台修,但明伦纂:道光《广顺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7册,第455页。

央，臭曰好呀蔑半，冷曰申，热曰兰，软曰奶，硬曰戎米奶。”^①

（三）数量词及颜色词

清代贵州方志所记录的数量词不可谓不丰富，若论其内容，多为低位数一至十，高位数则有百、千、万等，数词之后，亦偶有连同量词一并记录的情况。例如道光《永宁州志》卷10《风土·苗语仲语合译_{左苗语、右仲语}·数目》：“一曰依、望，二曰阿、宋，三曰巴、散，四曰褒、西，五曰卑、阿，六曰娄、绕，七曰臧、差下去，八曰以、边，九曰觉、姑，十曰古、仇，百曰依博、把了，千曰一生、玩了，万曰依望、凉了。”^② 本则所记苗语低位数词“一”至“十”中，苗语“一”借用汉语借词，其余保留固有词，仲语则全为固有词，相比之下，两种民族语言数词，仲语更为保守、稳定；高位数词“百”“千”“万”，苗语均借用汉语表达，仲语则保留其原有词，亦可见侗语数词更为稳定之特征。又仲语“百”“千”“万”皆“X+了”结构，其中“了”的意义和用法值得探索分析。

颜色词的记录虽不算详尽、丰富，但也比较常见，例如道光《安平县志》卷5《苗俗·苗语仲语合译_{左苗语、右仲语}·颜色》：“红曰伦、伦，紫曰都伦、渝，赤曰都摸、邦翁，黄曰广、烟，青蓝曰波素、温滥，绿曰波、论，白曰刀、告，黑曰胧、晚。”^③

（四）短语和句子

清代贵州方志中，短语和句子类记录较为少见，但由于其间往往蕴含着比字词更为丰富的信息，整理研究时，应尝试逐字逐句溯源，以期从词法和句法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例如乾隆《独山州志》卷3《地理志·方言·蛮歌》：“‘利完_{入声}案绕寮喇闷，锅_{上声}玩滴赧盎笑眉。歹冰_{入声}蒲乃觅离宝，胆软底般_{入声}攘晚枯_{入声}。’译之曰：‘盛世恩膏遍普天，衢歌击壤乐陶然。太平愚贱无将报，但愿江山享万年。’‘线逃_{入声}亥凹寮槐吝，贬线更_{去声}老_{平声}也降阑_{入声}。软求_{入声}菩完_{入声}教敛备，晚般_{入声}蒲乃盎备黎。’译之曰：‘仙桃开花满树红，八仙饮酒在堂中。愿祈人主活千岁，万国黎民乐岁丰。’盖此地彝人亦有读诗书者，能以彝语为诗歌，其声亦有音节，故取其一二，以见文教之远敷云。”^④

（五）特殊地名

地方志所记录的民族语言资料，地名是必不可少的版块，整理与研究时，不能视而不见，但什么样的地名材料方能称之为“民族语言资料”，需要仔细斟酌，即便已确定其为民族语言资料，却仍需进一步筛选鉴别，筛选鉴别的标准，则应以具有典型性、系统性并能从中找寻语言与民族文化内涵者为首要，此之谓“特殊地名”；属于民族语言资料，但其中蕴含的语言和民族文化内涵不突出者，可一笔带过，而不必纠缠，否则难免堕入繁复浅泛之境。

清代贵州方志中，“特殊地名”并不鲜见，例如嘉庆《黔西州志》卷2《村寨》所记“以者”“以朵”“以那沟”“以那坝”“以骂”等地名^⑤，其中“以”为彝语，意为“水”。可知这些带“以”的地名多为彝族村落，其命名理据或多或少都与水相关。又如道光《永宁州志》卷3《地理·村寨》所记“那大”“那花”“那得”“那稿”“那次寨”“那牌寨”“纳色寨”“纳代”“纳

① 张镛修，邹汉勋、朱逢甲纂：咸丰《兴义府志（一）》，“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8册，第394页。

② 黄培杰纂修：道光《永宁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0册，第561—562页。

③ 刘祖宪修，何思贵等纂：道光《安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4册，第188页。

④ 刘岱修，艾茂、谢庭薰纂：乾隆《独山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4册，第94页。

⑤ 参见刘永安修，徐文璧等纂：嘉庆《黔西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50册，第133—134页。

冗”“纳渡”“纳有”“纳劳寨”“纳沙寨”等地名^①，其中“那”（纳）为壮语，意谓“田”或“水田”^②。可知这些带“那”（纳）的地名多为壮族村落，其命名理据或多或少皆与田地相关。

以上五种类型的语言资料，均以汉语同音或音近字记录，且“词”（词汇）多而“语”（短语或句子）少，名词最多，动词、形容词、数词也较常见，虚词则鲜见。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古代方志修纂，常常不免辗转因袭、不事创新、敷衍潦草、不负责任之弊，清代方志所记录的民族语言资料，亦有此弊，故整理研究时，重复的材料，一定要根据方志修纂时间，择选其最早者而用之。譬如，同一则材料，经考察比较，现有方志中，康熙年间所修纂某志最早记录，其后乾隆、光绪、民国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若干方志均有记录，但应以康熙年间所修方志之记录者为基础依据，这样才能更加接近语料的历史真实。

三 清代贵州方志所记录民族语言资料的价值

清代贵州方志中记录着丰富的民族语言资料，很有必要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整理与深入研究。大体而言，其价值直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可增进语言与文化关系之研究。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其语言中均有或多或少地体现。清代贵州方志所记录的民族语言资料，其间承载的文化信息并不单一，且往往有迹可循。例如光绪《水城厅采访册》卷4《食货附族姓》：“传安氏谱系谓其祖有堵穆者，其第六子曰穆济济，济济子曰济济火。历十数世，为奶阿助，助死，助阿补嗣，支子为助阿扒瓦，补死，阿署嗣；署死，署阿统嗣，其长子曰统莫补，为芒部陇氏，其少子曰统阿者，为阿蚌部；阿者死，阿者比于嗣，历十数世，为都阿遮，遮死，遮阿夺嗣，其支子曰遮阿以芝；又数世，为主色阿更，其子曰阿更阿珮；历四世，为普露，其弟凡四十有七，有曰以列、曰白义者；历二世，为普贵；历五世，为阿榨，其子曰阿榨亦奚，亦奚子曰亦奚不薛；历数世，为阿画、为葛翠。历数世，为安贵荣，其子曰万钟，钟无子，弟万镒、万铨，镒子仁，仁子国亨，亨死，安疆臣嗣，其弟曰尧臣，子曰位俱，无嗣。安坤者，万铨之裔，陇氏、禄氏皆罗甸大姓，今东川土司多禄氏、镇雄土目多陇氏；沙姓本拜勒部，若姬姓者，本汉阳诸姬，因庄跻征滇，遂从戎来此，今汉上人犹递相传述云。”^③

罗常培曾指出：“父子连名制是藏缅族的一种文化特征。靠着它可以帮助从体质和语言两方面来断定这个部族里有许多分支的亲属关系，并且可以决定历史上几个悬而未决的部属问题。”^④此则所记录资料，可以在罗氏的基础上作有力佐证与补充，其中“父子连名制”的情况一共有以下几组：①穆济济→济济→济济火；②奶阿助→助阿补、助阿扒瓦→补阿署嗣→署阿统→统莫补、统阿者→阿者比于；③都阿遮→遮阿夺→遮阿以芝；④主色阿更→阿更阿珮；⑤阿榨→阿榨亦奚→亦奚→亦奚不薛。安贵荣之后是万钟，万钟之后分别是万镒、安仁、安国亨、安疆臣、安尧臣，可见，自安贵荣始，该谱系父子连名制废弃，这很有可能即其氏族被汉文化显著渗透的重要标志。姓氏传承，实乃民族文化及身份标记极为重要的因素，此要素一旦不复存在，便可推断一个民族之文化已发生重要变化。又，安贵荣、安疆臣、安尧臣之姓名，不但有明显汉化特征，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内附归顺、辅助治国、安邦乐民等汉文化特征。

① 参见黄培杰纂修：道光《永宁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0册，第490—493页。

② 参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1页。

③ 陈昌言纂修：光绪《水城厅采访册》，“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5册，第284页。

④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86页。

又如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卷4《地理·附方言·仲家语》：“父母曰拨蔑，州主曰赛达，兄曰彼，弟曰暖，姊曰彼囊，妹曰暖囊。”^①称兄曰“彼”、弟曰“暖”、姊曰“彼囊”、妹曰“暖囊”，可知，兄、弟以“彼”“暖”区分，“姊”“妹”亦以“彼”“暖”区分，其中“彼”“暖”类似于汉语“（排行）大（的）”“（排行）小（的）”之意；不过，其指称“兄”“弟”时，所指已约定俗成，而不必标示“男性”这一性别，其指称“姊”“妹”时，所指则未经约定俗称，需要标示“囊”（女性）这一性别。从这种称谓词的构词方式可知，该语言中兄、弟、姊、妹之称，隐含男尊女卑之意。

其二，有利于综合考察民族语言词汇的理据和内涵。语言研究中，田野调查由于受客观条件之约束（如语言的历时因素），其所关注的信息，有时不一定以调查对象的理据和内涵为重点，古代地方志所记录的民族语言资料则可以对这一短板进行补充。清代贵州方志所记录的不少民族语言词汇，其间的理据和内涵颇为微妙，很值得考索，例如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卷4《地理附方言·罗罗语》：“梅曰萨革尾，桃曰萨勿尾，李曰萨菊尾凡读花为尾，核桃曰萨绵，栗曰宅平声，柳曰呢。”按：梅、桃、李、核桃，均为“萨+x”的构词方式，但梅、桃、李的构词方式在上述“萨+x”的基础上还多了一个“尾”，即“萨+x+尾”，又据“李曰萨菊尾”一条附注“凡读花为尾”可知，“尾”意谓“花”。梅、桃、李、核桃四种植物宏观上同为“萨+x”结构，微观上却稍有区别，即梅、桃、李之名称中有“花”，而核桃之名称中无“花”——这可能因为梅、桃、李虽为果木，但它们所开的花引人注目，故构词时除了突出其果木之属性外，还特别突出其“开花”之属性，核桃虽然也开花，却不能引人注目，故其构词理据中只突出果木之属性，而忽视其“开花”之属性。此种构词方式，其间蕴含的民族心理及思维方式颇为微妙。

又如咸丰《兴义府志（一）》卷42《风土志·方言·仲苗语·鸟兽》：“鸡曰盖，鹅曰雁，鸭曰都迸，鸦曰哑，猪曰都暮，羊曰都庸，狗曰暮，马曰都麻，水牛曰都歪，黄牛曰都胃，鼠曰都奈，兔曰丹罗，猴曰都灵，虎曰谷，豹曰梁。附考：永宁仲语，狗曰拉骂，鼠曰都嗅，兔曰毛，虎曰都恐，豹曰都空。余同。”^②按：兴义府仲语“鸭”“猪”“羊”“马”“水牛”“黄牛”“鼠”“猴”的构词方式均为“都+x”，而“虎曰谷”“豹曰梁”，其构词方式不在“都+x”的范围之内，可知该地仲语中，“虎”“豹”与“鸭”“猪”“羊”“马”“水牛”“黄牛”“鼠”“猴”并不划分为同一类型的动物。但反观永宁仲语，“虎曰都恐”“豹曰都空”，可知该地仲语中“虎”“豹”与“鸭”“猪”“羊”“马”“水牛”“黄牛”“鼠”“猴”并属同一类动物——同一民族对某一事物认知及归类上的差异，可能和语言接触或地域文化有关系。

其三，可更为直观地分析民族语言中特殊的构词方式。例如道光《广顺州志》卷1《风俗志附方言》：“苗音鸹舌，非翻译不解……呼黄牛曰大躍，呼水牛曰大业，呼虎曰木瓜，呼马曰大美，呼骑马曰藏美，呼羊曰大客，呼猪曰大把，呼鸡曰大哈，呼狗曰大狗，呼鱼曰大某，呼鹅曰大奴。”^③按：本则“黄牛曰大躍”“水牛曰大业”“马曰大美”“羊曰大客”“猪曰大把”“鸡曰

① 曹昌祺修，覃梦榕、李燕颐纂：光绪《普安直隶厅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4册，第351页。

② 张镛修，邹汉勋、朱逢甲纂：咸丰《兴义府志（一）》，“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8册，第397页。

③ 金台修，但明伦纂：道光《广顺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7册，第456页。

大哈”“狗曰大狗”“鱼曰大某”“鹅曰大奴”诸条目中，隐含一个重要信息，即该语言中，动物的命名通常为“大+x”之形式，其间“大”是大名，“x”是小名（即具体名称），例如“黄牛曰大躍”，“大”为大名，其义犹“可饲养动物”，“躍”为小名，其义为“黄牛”。这一点，与王引之、俞樾等人提出的汉语中“虫蝗”“草茅”“禽犊”“鸟乌”等词语类同，进而可知，“大名冠小名”之结构，可能是汉藏语系早期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又，本则中“呼虎曰木瓜”一条，疑当作“呼虎曰大瓜”，“木”“大”形近而误，因邻近所记均为动物名称，且均为“大+x”构词形式，“木瓜”颇不谐；反之，若“木瓜”不误，则可推知，该语言中动物名称“大+x”的构词形式，只限于已饲养驯化之动物，其余未被驯化、未能被饲养的类别近似之动物，统统不在此构词法之内——名物词的属性，通过特定的构词法便能准确得知，这算是该民族语言所具有的不可忽略的智慧。

又如咸丰《兴义府志（一）》卷42《风土志·方言·仲苗语·称谓》：“先生曰章瑞，媒人曰补司，僧道曰阿遁，巫曰文亡，佃曰娄张，缝人曰文牛，庖人曰文厨，木匠曰文歪，瓦匠曰文瓦，石匠曰文硬，保人曰包都文，中人曰凭端；我曰皆蒙，你曰皆沾，书吏曰仲同，差役曰阿差，禁卒曰阿斋，乞丐曰阿弩，盗贼曰不劣，囚曰里芮，余与郡仲同。”^①按：由本则所记可知，该民族语言中，“巫”“缝人”“庖人”“木匠”“瓦匠”“石匠”等词，构词形式同为“文+x”（其中“文”是通称，其意义类似于汉语的“匠”），构词方式同为“大名（通名）+小名（具体名）”；又，“差役”“禁卒”“乞丐”三者构词形式同为“阿+x”，其中“阿”可能是一种通称，有可能隐含“地位低下”之义，若果如是，则该民族文化观念中，差役与禁卒之身份地位，类同于“乞丐”，处于社会最底层。

另，贵州方志所记录的民族语言资料，能够为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的交流提供佐证，尤其是其所记录的基本词汇中的借词，可以作为彼时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证据。

此外，地方志所记录的民族语言资料，其数量丰富，分类规范，清晰可靠，且其所记录的对象多为百年前民族语言中的基本词汇，这对于考察研究相关民族语言词汇、语法、文字等在相对较长历史过程中的继承、发展和演变，是大有帮助的。很多民族语言的历史，并不能够如汉语等强势语言，可以借助大量的书面材料代代传承，进而可以考察其几千年以来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各方面的历史发展——汉语史的主线便如此。因之，要从语言史的角度研究民族语言，尤其是弱势或没有文字的民族语言，地方志所记录的民族语言资料是通往这一目标的有效、可靠之途径，甚至可以说，舍此途径，似乎就很难再找到其他更好的道路。

总之，贵州作为多民族省份，其民族语言资源非常丰富，研究价值甚大，然而，如果仅以现代贵州民族语言为基础，其研究难免受约束，故清代贵州方志中民族语言资料的整理研究，能够与以田野调查为核心的贵州民族语言研究互为两翼、融为一体，从而有助于构建贵州多民族文化立体、动态之语言蓝图，这应当也是历代贵州方志所记录的民族语言资料整理研究的核心价值之一，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方可达成。我们期待该领域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能够在学术资源丰富、学术氛围浓厚的大背景下，不断朝繁荣昌盛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张铨修，邹汉勋、朱逢甲纂：咸丰《兴义府志（一）》，“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8册，第393页。